

时期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从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个视角综合研究。杨奎松认为,抗战史研究中,过去只阐发抗战中积极方面的经验,如作深入研究,也应对一些历史教训,例如民族内部不团结等进行总结。王树荫认为,在抗战史研究中,应考虑如何将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统一起来。肖一平认为:应加强专题研究,同时要组织编写一部具有科学性的抗日战争通史。张注洪认为,研究抗日战争史应关注台湾、香港和国外的研究状况。他分析了海外学者有关中国抗战史研究状况,认为:美国的研究成果数量虽不多,但影响最大;前苏联的研究状况比较滞后,且意识形态色彩极浓,苏联解体后,这一领域几乎无人涉足;日本自 50 年代后,开始广泛深入地展开研究,成果最丰富,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当大部分著述不能正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

(以林)

中国史学会举行纪念抗战胜利 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1995 年 7 月 5 日,中国史学会五届二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余位史学会理事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致开幕词,他回顾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巨大历史灾难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后,指出:“抗日战争的深刻教训是霸权不可能得逞。半个世纪以前,德国、意大利、日本依靠精锐的武器和军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侵略蹂躏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在人民的团结战斗下,法西斯主义终于得到了可耻失败的下场。”

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作了即席发言。他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阶级矛盾降到民族矛盾之下，但并没消除。抗战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倡导并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破裂。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国共双方力量发生了变化，它为战后民族独立和近代化的前途开辟了道路。在论及抗战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时，他分析道：在中国抗战的前四年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只有一个东方战场；后三年多的抗战是和同盟国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单独的胜利，同样也不能因美苏对日参战而降低中国的地位。在反法西斯集团内部存在着许多矛盾，它们的发展演变过程是值得学术界加强研究的一个课题。当前，在日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东京审判否定论”等妄图篡改历史的谬论仍很猖狂，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齐世荣分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贡献。他用三句话概括说：中国的抗战得到的国际援助很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巨大，中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取得了民族解放。他分别以1939年的欧战爆发和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界限，将中国的抗战分为三个阶段。欧战爆发前，中国仅得到苏联的有限援助，而英美则坐壁观战。中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抵抗住了日本的侵略。在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许多会战，敌后战场也有百团大战，对此我们应予以客观评价。正是由于中国依靠自力更生、英勇抵抗，才阻止了日军的北进，拖延了它的南进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中国得到外援仍是有有限的。美国租借法案颁布后，英、苏、法三国分别得到302亿、98亿、14亿美元，而中国仅得到6.3亿美元，却在东方战场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抗战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孙达人指出：“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决不可以忘记一个极其矛盾的事实：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错位，其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侵略者对世界的侵略早就发动了，而世界主要国家的应战却大大

地滞后。”“这是当时各个大国都以极端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为核心,奉行口是心非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可耻的慕尼黑协定、苏德和苏日分别签订的所谓互不侵犯条约、美国的所谓中立主义等等,在冠冕堂皇的辞令的背后其实都包含着不可告人的企图。一般说来,对于别国的这种损人利己的行径,特别是象张伯伦和达拉第那样已经彻底破产的绥靖主义大都遭到了应有的批判,人们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作为战胜国美苏的不体面行为,由于后来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否认的功绩却多少被掩盖了,以致迄今还远不能说已经获得了恰如其分的评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新老交替必将使世界愈加淡忘了战争的创伤;各国间的贫富分化日益分化;战后战败国的经济发展普遍好于战胜国的变化,迄今尚未得到理性的铨释。作为历史学家理应向人民提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的历史反省,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纪念这场战争 50 周年的最好形式。”

罗荣渠在发言中指出:“二战”爆发前,西方国家和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都是不清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应重新认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同盟国之间建立起从未有过的军事战略合作关系;日本对战争反省不够的主要原因是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不彻底。我们今天研究二战史,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主要的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向下一代人讲明历史真相,防止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抬头。

金冲及论述了 1944 年大后方各阶层人心巨变的内在因素,分析了中共“联合政府”主张在此时提出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这次人心大变动造成强大冲击波,不仅影响了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局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陈孔立分析了台湾在日据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演变过程,指出:台湾受日本 50 年的殖民统治,对日本的感受、看法同大陆人民是不同的,同海外华侨也是有区别的。如果不了解日

据时代台湾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体会当代台湾人民的心态

葛剑雄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总结抗战中的反面教训,应该对当时统治者的腐败和民族心态中暴露出的弱点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尽管中国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但麻木不仁的人仍有很多;而对比日本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相对来讲战时的反战人士要少得多。我们不能为了某些宣传而回避历史。他认为现在有所谓“联日制美”的说法,那是一厢情愿。如果不能很好地总结并吸取教训,是对不起抗战中牺牲的几千万先烈的。

特布信(蒙古族)和穆合塔拜尔(乌兹别克族)分别论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内蒙和新疆各族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作出的贡献。陈胜舜分析了日军侵粤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皮明麻介绍了华中日军投降前后的史实。乔志强比较了甲午战争失败和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是抗战期间中国社会近代化程度远远高于前一个时期。张培德强调史学工作者应该正确引导当代青年了解先辈们的光荣历史,振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龚书铎针对西方殖民统治(包括日本)与东方民族觉醒及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中存在的一些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晓 今)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举行抗战 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1995年5月25日,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杨成武、李德生、李耀文等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和来自国际大学、军事科学院、外交学会、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中国委员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务院国际